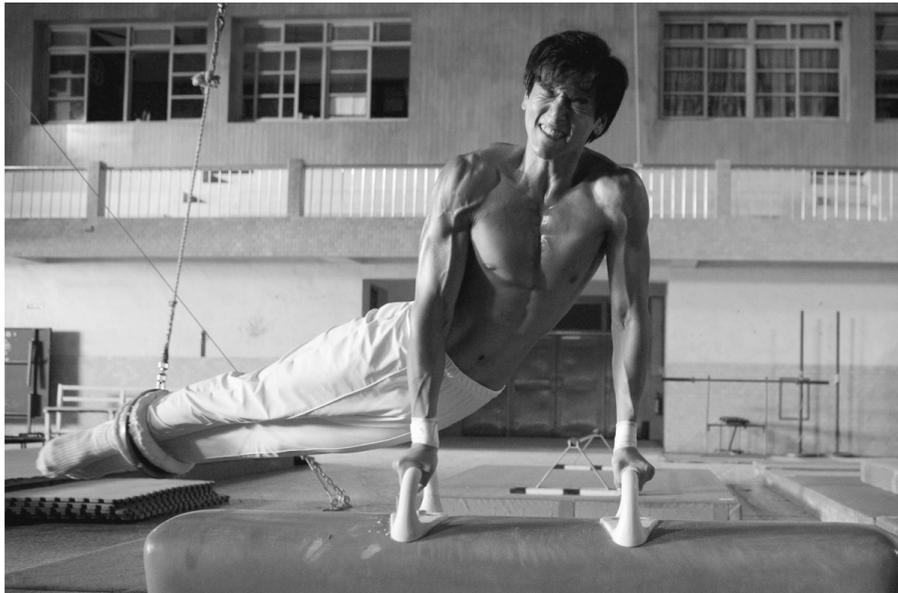


体育题材电影不好拍

本报实习记者 罗群



体育题材电影《翻滚吧！阿信》(左)、《愤怒的公牛》(右)。

体育题材电影或许会让许多人觉得陌生，甚至影迷也很少看过这类影片。中国近年来在竞技体育上的表现不可谓不突出，但是体育题材电影的创作却比较稀少，是因为创作难度大令人望而却步，还是因为担心拍出来票房不理想而敬而远之呢？如今，中国电影市场发展极快，这是否会促进体育题材电影创作并为之带来新的机遇呢？

7月14日，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主办，专注于中国影视编剧的新媒体“编剧帮”与北京歌华文化中心有限公司承办的“体育题材电影的机遇与挑战”专题论坛在京举办，与会影人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体育题材是个大冷门

严格说来，与体育相关的电影除了体育题材电影，还有体育类型电影。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周铁东说：“体育类型电影总是让观众有一种箭在弦上的感觉，用一个个情节高潮表现体育本身；而体育题材电影通常跟青春片、浪漫喜剧、校园电影等其他类型片嫁接起来，体育只是它的一个方面或切入点。”

在与体育有关的电影中，体育题材电影要比体育类型电影数量多，但中国体育题材电影的数量与中国在各类体育赛事上取得的奖牌数仍是不相称的，据“编剧帮”创始人杜红军统计，在中国电影百年历史中，体育题材电影数量不过百余部，能被观众记住的更是寥寥无几。周铁东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印象深刻的体育题材电影还是拍摄于上世纪中叶的《女篮5号》和拍摄于十几年前的《女足9号》。”

一个成熟的电影市场应该是各种类型和题材百花齐放，对于体育题材电影的缺席，周铁东认为，主要原因是体育还没有成为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我们总是认为体育是属于运动员和国家的，而不是属于普通人的，也不是属于电影和观众的。”

这种观念与美国很不一样。北京武尔卡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关雅荻的一位美国朋友告诉他，美国家长之间见面寒暄，通常会问：“你孩子最近在练什么？”这种全民体育观念在中国显然还不具备。“我们的电影人应该用艺术告诉观众，我们还可以拥有体育这样的生活方式。”关雅荻说。不过好在随着人们对身体健康的日益重视，体育观念正在逐渐深入人心。

拍出体育精神很重要

影人对体育题材电影的期许不仅是填补一个题材空缺这么简单，论坛主持人、知名评论人石述思说：“我希望体育题材电影的大量出现能让我们这个民族更有血性、更刚毅。”

“体育尤其是团体项目非常讲求团结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这对增强民族凝聚力有好处。”北京小马奔腾集团副总裁李立功说。李立功小时候在体校接受了8年体育训练，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对体育和电影都深有感悟。谈到体育和体育题材电影对受众的影响，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发行分公司副总经理贺文进也深有体会。贺文进退役曾是国家二级运动员，驰骋绿茵场。“足球教会了我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教会了我团队精神，教会了我坦然面对胜利或失败——这就是

体育精神。我觉得拍体育题材电影具体选用哪个体育项目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体育精神拍出来，影响我们的观众。”

体育题材电影能够承载的精神、价值并不限于体育精神。即将上映的体育题材电影《破风》的一款父子同行的宣传海报深深打动了贺文进。“破风”是自行车比赛专业术语，指的是在高速骑行下，自行车手需要突破空气阻力以达到最快速度，车队中的“破风手”就起到打乱对手节奏以助本车队中“车王”获胜的作用。“把破风和父子联系起来，让人想到父亲为孩子付出的浓浓亲情。不管你是不是体育迷，亲情是每个人都有的，这种嫁接赋予了体育题材电影更广泛的适应性。”贺文进说，“就像《愤怒的公牛》一样，它借体育题材探讨的是人如何面对困难和诱惑。体育题材为很多类型片的精神探索提供了很好的人口。”

体育题材的空缺不好填

体育题材电影虽然有种种潜力，但是拍好它并不容易。台湾导演林育贤凭借《翻滚吧！阿信》蜚声影坛，这部讲述体操运动员阿信的励志故事的影片也打动了许多观众。“我觉得体育题材电影不是编导喜欢哪个项目就可以去拍哪个项目的，你必须沉入项目中，明确这项运动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林育贤说，“我哥哥就是体操运动员，他说他拼搏十年二十年就是为了赛场上翻身的那一刻，他说他从起跑跑到跳马器械那里只需要不到10秒，但为了这么一段路，他努力了那么多年。我深切体会到了这项运动对于一个运动员的意义，我把它拍出来一定也能打动别人。”林

育贤感到，对体育深层内涵的体会和挖掘需要时间，对它的呈现需要灵感和机遇，《翻滚吧！阿信》他20年前就想拍，但是这部影片直到2011年才上映。体育题材显然比青春、都市、爱情等题材更需要专业知识和视角的介入，对林育贤来说，即便条件成熟，酝酿一部作品起码也要3年。

3年对于大陆的编导来说是个漫长的创作周期，他们普遍反映“等不了”。曾创作过《中国合伙人》、《亲爱的》的编剧张冀正在着手创作一部体育题材电影——《李娜》。“我用半年了解网球和全世界的网球运动员，当然重点要了解李娜的经历、心理。但是按照大陆普遍的创作节奏，3年一部肯定不行，速度快也许要牺牲掉一些对质量的要求，但是没办法。”张冀说。

这部计划于明年上映的电影《李娜》由陈可辛执导，以尚在人世的前明星运动员为题材的电影引起在场影人极大的兴趣，其可能要面临的困难也让人深思。“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对于一位尚在人世的体育明星，你怎么写她，她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你的创作，这都有可能给电影主创带来问题。”周铁东说。

如果说上述问题只是《李娜》的个案，那么李立功的担忧则更有普遍性。李立功认为，体育精神里固然包括集体主义精神、团队合作意识，但是特别优秀的运动员也带有极强的个人英雄气质。“从电影叙事角度看，作为个人英雄的对抗力量推动故事向前的往往是体制，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也确实如此，但这个东西很难找到合适的分寸去表现。这是体育题材电影想要跳脱宣传先进人物的框子，真正塑造出有血肉的、深刻的人物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陈凯歌心里住着个何安下

——评电影《道士下山》

罗群

沉寂数年后，名导陈凯歌带着他的《道士下山》华丽归来，甫一上映就引发热议：《道士下山》是承载着深沉情怀的力作，还是一部令人失望的烂片？

电影《道士下山》改编自徐皓峰的同名小说，原著的故事线索和情节相当复杂，一部2小时左右的电影不可能完整呈现。于是，电影《道士下山》以小道士何安下为线索人物，用他的见闻把故事串联起来，何安下在叙事层面上的作用与《围城》中的方鸿渐类似。这种手法在西方“流浪汉小说”中非常常见，说不上多高明，但的确是在有限时间内把一系列故事组织起来的有效方法。

从故事内在逻辑来看，崔氏兄弟与玉珍的故事和太极门内部斗争的故事几乎没有关联，但是若从何安下的内心成长和生命逻辑发展的角度看，这两个故事共同启发了何安下关于情欲、伦理、善恶等重大问题的思考，这些问题恰恰也是把“深刻”作为艺术追求的陈凯歌所关注的。正如“何安下”这个名字一样，《道士下山》关心人的心灵如何安放。

刚下山的何安下心思简单得对社会生活的规则没有概念，他甚至不知道钱的用处，饿了就抢别人的荷叶鸡。他在师父崔道宇家里发现了师妹玉珍与师父的弟弟道融偷情，道融后借玉珍之手将道宇毒杀，这给何安下了关于情欲与恶的第一课。何安下又亲历太极门内部斗争——掌门用诡计杀死徒弟后，又暗算师弟周西宇，比武失败后索性指使儿子将周枪杀，同门之义甚至基本伦常在争名逐利中荡然无存。这些故事赤裸地展示欲望的丑陋和人性的险恶。

如果说这种展示是很多影片都做得到的，那么《道士下山》的深刻之处在于何安下对欲望与人性之恶的态度——既否定抗拒，批判鞭挞，又迷恋期待，蠢蠢欲动，显出人性的复杂和深邃。他杀了玉珍，道融为师父报仇，用不合法的手段伸张正义，几乎是一个武松怒杀潘金莲故事的翻版。他吃了有毒的野物后心智混乱，红肿可怖的脸让人几乎认不出他本来的面目，这仿佛意味着欲望的升腾让人迷失自我，人很容易滑向恶的深渊。此刻的何安下想到抢功德箱里的钱满私欲，又想到与被自己杀死的师妹玉珍男欢女爱，他此时的心理与《金瓶梅》中武松杀嫂前，让潘金莲“旋剥了”跪在武二郎灵前的心理有相似之处，这种难以言喻的幽微正是人性复杂之所在。最后，查老板的出现让何安下明白了“坏人太多是因为好人不作为”的道理，两人联手除恶后一道上山“得道”，远离尘世、回归山林，解决了心灵如何安放的问题。

以上所说聚焦于人与自我心灵的关系，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道士下山》想说的似乎还不止这些。片子的时间背景设置在民国——一个摆脱封建时代，现代观念日渐萌芽的时期，然而何安下们的行事规则依然守的是江湖规矩。当何安下跟随查老板修成上乘武艺冲击市之刻，也恰恰是何安下必须身在山林而不容于世之时。尘世与江湖的隐隐对峙在片中随处可见，当超一流高手周西宇被一个武功相当差的人三枪毙命时，或许许多观众都会与笔者一样感到某种莫名的茫然。笔者想起老舍名作《断魂枪》中，伴着火车汽笛声，沙师父那句“不传，不传”，那是历史巨人走到某个关口，其身后阴影中踉跄英雄的失路与无奈——带有很大必然性甚至主动性的失路与无奈。影片借由武侠故事而试图走向历史。

从《黄土地》、《霸王别姬》开始，到《荆轲刺秦王》、《赵氏孤儿》，甚至包括口碑不佳的《无极》，陈凯歌一直怀着用电影与中国历史对话的追求，《道士下山》亦然。向历史凝眸也许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集体诉求和挥之不去的挂念，历史让他们丰富，也让他们沉重。比如同为第五代导演的张艺谋，美国人“打怪兽”喜欢设置一个悬置起来的时空，充满科技感又显得虚幻；而张艺谋请了好妻子、好母亲，她在丈夫身患绝症后暂时放下工作，陪丈夫出游，漫步芦苇荡，给丈夫织毛衣……这些都是影片中最细腻的细节，让人物显得更加真实、接地气、血肉丰满。

来自土地，又超越土地，从土地中汲取，又反哺于土地，《为了这片土地》乡土叙事与模范事迹的整合，无论对于乡土叙事还是对于英雄电影，都是一个启发。

展轻功站在漂于水面的葫芦上，因为没得到“人生怎么活”的确切答案而失足跌进水里，这正是一个历史转型期，价值和规则动摇以后，社会与心灵的秩序亦摇摇欲坠的隐喻。这类充满隐喻的镜头的运用，像极了拍《霸王别姬》的陈凯歌吧？笔者想起《霸王别姬》里的小豆子为了进入戏班（即被集体接纳），必须切掉那个多出来的手指（即把自我独异性阉割掉），陈凯歌用一个镜头说一件大事的本身一直没设。

陈凯歌有太多大事想说，《道士下山》专门搞了个画外音给其他电影手段敲边鼓。用有点孩子气的画外音叙述和观照一个复杂、世故的故事，拉开审美和思考的距离，这创意本不是不错的，只是道理讲得太多难免落了刻意。同样有些刻意的情节并不难找：比如查老板为什么宁可大打出手也不给警察局局长唱戏？道士犯了错为什么和尚忏悔？高僧表现上的一惊一乍、语言上的云遮雾罩加上宗教文化的纠缠缠绕，让人有点迷糊。另外，陈凯歌说《道士下山》过了“工业”这一关，然而笔者注意到查老板在戏园子里炫技后的那个亮相，稍有戏曲常识的人皆可看出张震起的完全不是大武生的范儿。一件工艺上完好的产品，细致打磨细节是很必要的。

比电影更热闹的是对电影的评价，心平气和的评价当然有，情绪化地调侃甚至痛骂则更多，有人将其概括为“逢陈必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专注电影并曾经主打文艺牌的某网络社群现已沦为各方神圣在此俏皮地展示“花式骂人技术”以自矜聪明的乐园，甚至有人调侃陈凯歌应该去拍三级片，着实是过分了。有一位论者似乎比较清醒，指出《道士下山》让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感到不适的原因是它的创作思路比较老派，不大符合今天的潮流。这个判断大抵不好找，精明的商人和狭隘的论者联手，我们还有可能、还有资格再拥有一个程蝶衣吗？

如今的电影圈热衷谈的是IP，不是情怀；是产业，不是艺术。据说，张国荣演《霸王别姬》的片酬在当时算是天价，笔者相信当年的陈凯歌团队对《霸王别姬》这种题材的电影上映可能遇到困难是有预判的，然而这个天价他们还是肯花。如今，肯真心为艺术碰钱的主儿不好找，精明的商人和狭隘的论者联手，我们还有可能、还有资格再拥有一个程蝶衣吗？

来自土地 反哺土地

——谈电影《为了这片土地》的乡土文化意蕴

李静 袁艳

新世纪以来，乡土叙事在文艺领域得到了广泛表现。不管是出于寻找精神家园的寻根意识，还是出于关心弱势群体文化意识，或是出于思考乡村命运的社会问题意识；也无论艺术创作还是理论批评，都在乡村题材上投入了大量关注。电影《为了这片土地》的一大特色便是将一位模范基层干部的事迹整合进乡土叙事之中。影片的主人公村支书王桂兰，生于乡村、长于乡村，热爱这片土地，这既为乡土文化的植入提供了前提，也使乡土文化成为烘托氛围、塑造人物、揭示主题的一个有力依托。

影片的乡土文化意蕴是多重的。就表层而言，影片营造了一种浓浓的乡土文化氛围：一是运用了大量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元素。王桂兰是满族人，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以颇具满族特色的剪纸的色彩、线条，结合皮影戏的画面来表现，叙事过程中也多次穿插剪纸这一元素，剪纸在这里成了满族农民承载情感、表达期盼的文化符号。另外两个东北特色民间艺术——大秧歌与二人转也在公路修通的庆祝会上隆重上演。二是借鉴了东北农村题材影视作品的一些常用手法，如东北方言的运用，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言行举止粗犷豪放、爽直

泼辣的东北风格，加上一些演员本就有东北农村题材影视作品的丰富表演经验，更给观众带来似曾相识感。影片中的乡土文化氛围使之极具生活的质感，使乡村真切地成为人物活动的广大平台和鲜活背景。

影片的人物塑造也体现着乡土特色，它有意塑造了一批具有乡土气质和乡土性格的村干部。主人公王桂兰的开场白朴实、质朴，流露着眷恋土地、看重乡情、珍惜亲人等乡土意识。她的得力辅助秋月更是一个典型的东北农村妇女形象，粗中有细，外表泼辣直爽，内心厚道善良。

以乡土文化氛围的营造和乡土性格人物的塑造为基础，影片乡土文化的最深层内涵是揭示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与乡土文化间的复杂关系。中国乡土文化千百年传承下来许多朴实的道德，如重视血脉传承的家族意识、强调友善互助的乡情意识、对土地家园的真挚眷恋、对幸福生活的勤奋追求、对后代子孙的倾心付出和殷切希望等。王桂兰不平凡的人生之路与这种“草根道德”力量的推动、民间情感的濡染是分不开的，影片对此有着生动的呈现，王桂兰每一项行动的动因都与乡情和中国乡村女性的传统美德息息相关，她在工作

中也注重运用乡土道德情感意识、人伦准则进行沟通。她不摆干部架子、淡化村官角色，将心比心与群众打成一片。她这样的工作方式和作风之所以能获得村民的支持和拥戴，正因为她与百姓心心相通，有着共同的乡土意识和人伦情感。

另一方面，影片也没有忽略王桂兰与乡土文化、乡土人伦情感的矛盾和冲突。作为一位有修养有觉悟的党员干部，她汲取了她所赖以成长的乡土文化的养分，却不局限于乡土文化，她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这就必然要与乡土文化产生某种冲突。冲突大致可分为两类，构成了影片叙事的张力。一类是与乡土文化的局限性，与其消极、保守一面的冲突。如乡土文化对亲情的倚重固然带来了天伦之乐的温暖，但有时也造成了家族主义的狭隘，王桂兰不肯违背原则让自己的亲人沾光，被指责为六亲不认；许多农民固守自然淳朴、知足常乐，但也有保守的一面，王桂兰的许多致富计划一开始都被怀疑，修路更是遭到钉子户的阻拦。这些冲突展示了创业的艰难，对它的解决又有力地推动了叙事。另一类是与乡土文化中一些朴实、美好情感不可避免的矛盾，主要是王桂兰的



村支书角色与妻子、母亲角色的冲突。她有着乡村女性的勤劳、贤惠，想好好地当妈、当媳妇，每每答应丈夫再干满一任就从村支书职位上退下来，却被身为党员干部的责任感和对乡亲的深情驱策着，不由自主地干了一任又一任，因此对家人充满愧疚。影片的好开头和结尾，她都在述说着自己不是好妻子、好母亲，她在丈夫身患绝症后暂时放下工作，陪丈夫出游，漫步芦苇荡，给丈夫织毛衣……这些都是影片中最细腻的细节，让人物显得更加真实、接地气、血肉丰满。